

对国外教育社会学的介绍研究及其文献的回顾

杨昌勇

华东师大

钱民辉

北京大学

一、国外教育社会学

介绍研究的几个阶段

到目前为止,我们对国外教育社会学理论的介绍研究大致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82年以前的“零星介绍”时期。以前述的“座谈会”为界,在此之前的介绍研究,从发表的成果来看,不仅文献量小,而且介绍的内容也不系统,更为主要的是,这一时期教育学界和社会学界并没有对国外教育社会学进行“有意识”的介绍研究,更没有形成教育社会学研究的学术共同体。不过从发表的几篇重要文献来看,学者们试图把握国外教育社会学的概貌和总体趋势的追求却是明显的。这些文献主要有:

[法]阿兰·格拉 张人杰译:《教育社会学的四个研究趋向》,《外国教育资料》1979年第3期;钟启泉译:《教育社会学的发展》,《外国教育资料》1979年第3期;马骥雄:《“教育成层论”简介》,《外国教育资料》1979年第4期;《教育社会学处在十字路口》,福建师编《外国教育资料参考》1980年第1期;卫纯:《欧美各国教育社会学简介》,《教育研究》1981年第10期;环惜吾:《英国教育社会学的发展和近况简介》,《外国教育动态》1981年第1期。

第二阶段是1982年至1988年的“宣传补课”时期。

“座谈会”之后,许多学者开始了对教育社会学的自觉研究,发表了一大批论文,其间还出版了一个完整的译本,即前苏联菲里

波夫著,李震雷等译:《教育社会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从整体来看,这一时期的介绍研究带有明显的“普及宣传”的“补课”特征,这些文章似乎是人们学习教育社会学的重要信息源。这一时期较注重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理论的介绍,主要有:

吴有:《教育社会学简介》,《外国教育动态》1982年第1期;厉以贤:《西方教育社会学的发展阶段及其特点》,《外国教育动态》1983年第5期;[美]S. S. Boocock, 扈中平译:《教育社会学范畴》,《华中师院研究生学报》1984年第3期;张人杰:《西方“教育民主化”初探》,《高等教育学报》,《外国教育》1985年第1—2期;桂万宏:《教育社会学的理论研究》,《外国教育》1985年第2期;[苏]P. P. 古罗娃,刘祝三译:《社会主义国家对教育社会学的研究》,《沈阳师院学报》1986年第1期;[美]弗雷德·马勒,马继森译:《教育社会学范式发展的总模式》,《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86年第2期;[法]埃比托·热比尔,张人杰译:《教育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及其含义》,《外国教育资料》1986年第5期;吴康宁:《当今欧美教育社会学三大学派》,《教育研究》1986年第9期;[苏]P. P. 古罗娃,刘祝三译:《马克思主义教育社会学的对象与任务》,《沈阳师院学报》1987年第4期;张人杰:《西方学校教育社会学研究》,《外国教育资料》1987年第

4—5期。

我国学者撰写的学术著作也很强调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诠释,它们是:

裴时英:《教育社会学概论》,南开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桂万宏、苏玉兰:《教育社会学》,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卫道治、沈煜峰:《人·关系·社会——教育社会学观略》,湖南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1988年3月版。刘慧珍:《教育社会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8月版。

但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有些介绍是带有综合性与研究性的”,如厉以贤,张人杰、吴康宁等人的文章(见厉以贤、刘慧珍:《教育社会学的复兴与发展》,《教育研究》1989年第1期)。

第三阶段是从1989年至今的“初步繁荣”阶段。

1989年4月在杭州成立了以张人杰为主任委员的“学院派”式的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会研究会所属的教育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它标志着中国教育社会学学术共同体的正式确立。这一年出版了两本重要的学术著作,1989年6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张人杰主编的《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文选》。该书是我国第一本比较系统的国外教育社会学名家名篇汇编,为从以前的“介绍性工作”转向本阶段的“研究性工作”起到了奠基作用。1989年7月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厉以贤、毕诚编著的《教育社会学引论》,该书首次对我国教育社会学思想史作了勾勒,更为主要的它对国外教育社会学理论学派,进行了比较系统的介绍。在这一时期,张人杰主编的论著《西方教育社会学论稿》以讲议打印本形式在一定范围内开始交流,有一定的影响。

1989年9—10月,春秋出版社还出版了一套《当代教育科学译丛》,其中的三本教育社会学著作颇有影响,它们是:

[英]戴维·布莱克吉等,王波等译:

《当代教育社会学流派》1989年9月出版; [美]珍妮·H.巴兰坦,刘慧珍等译:《美国教育社会学》1989年10月出版; [日]友田滕正编,于仁兰等译:《日本教育社会学》1989年10月出版。

1992年10月厉以贤又与港台学者合作出版了一个新的文选本《西方教育社会学文选》,五南图书出版公司,收集了44篇重要文献,很有价值,只可惜该书未在大陆出版发行,否则影响会更大。

从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介绍文章具有明显的研究色彩,出版的几本重要学术著作也试图融介绍、移植和创新为一体,如:

董泽芳:《教育社会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9月版;鲁洁主编:《教育社会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10月出版;吴铎、张人杰:《教育与社会》,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1月版;金一鸣主编:《教育社会学》,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6月版。其中鲁洁主编的《教育社会学》文科教材发行量最大。

1991年8月在天津又成立了以厉以贤为会长的“实证派”式的中国社会学会教育社会学研究会。我们这里使用“学院派”和“实证派”的字眼并无褒贬色彩,它只是我们对两个学会细微差别的简单概括。其实有些学者本身就同时是两个学会的会员。大体说来,学院派会员基本上由青一色的大学教师组成,该会注重教育社会学基本理论的研究和介绍,重视教育社会学的学科体系和课程建设,其微观的课堂社会学研究也具特色。“实证派”成员除了大学教师之外,还吸收了一些社会学家,政府部门的教育咨询专家,企业、城市和乡村社区的教育管理,研究人员和教师,在学术上除了教育社会学基本理论的研究和介绍外,近年来在社区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颇具特色。

二、国外各国教育

社会学概况的介绍研究

对国外诸多教育社会学研究相对发达的国家,我国的几本学术著作均无专章加以介绍,这不能不说是一件遗憾的事。在现有介绍研究文章的基础上,补充以新材料编一本《国外各国教育社会学概况》的书是很有价值的。

1. 前苏联的教育社会学

关于前苏联的教育社会学,除了菲里波夫的著作《教育社会学》之外,翻译文章还有:

刘立:《苏联关于教育社会学问题的讨论》,《外国教育》1982年第2期;[苏]菲里波夫,曹默林译:《苏联的教育社会学》,《学术情报》1988年第1期;[苏]古罗娃,刘祝三译:《社会主义国家对教育社会学的研究》,《沈阳师院学报》1986年第1期;[苏]P. P 古罗娃,刘祝三译:《马克思主义教育社会学的对象与任务》,《沈阳师院学报》1987年第4期;苏国勋:《苏联教育社会学简介》,《教育研究》1982年第4期;桂万宏:《教育社会学的理论研究》,《外国教育》1985年第2期;刘要悟:《苏联的教育社会学研究》,《国外社会科学》1989年第5期。

有的评论家指出,前苏联的教育社会学研究具有刻板性,缺乏开放性,其功能仅仅是为证明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阐述的经济发展规律积累证据。这一见解值得我们重视。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教育社会学现状似乎还没有介绍文献发表。

2. 美国的教育社会学

许多介绍研究文章都谈到了美国的教育社会学,比较系统的介绍除了刘慧珍等翻译的《美国教育社会学》之外,主要还有:

吴小平:《西方教育社会学的发展概述》,《外国教育动态》1985年第6期;吴纲:《美国教育社会学的回顾》,《外国教育资料》1992年第6期;[美]E·拉吉曼,禾子译:《康茨及其教育社会学研究》,《国外社会科学》1992年第12期。

19世纪末至本世纪初的10年是“教师的社会学”时期,20年是美国教育社会学独立制度化时期,也是“教育的社会学”时期,30年代到二战结束为“为教育问题的社会学时期”时期,二战后至50、60年代是复兴的转变时期,其主流是社会学者研究的理论教育社会学,60、70年代是教育学家和社会学家逐渐结合的深入研究时期,同欧洲的教育社会学一样,美国的教育社会学也朝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追求量化、实证化的科学教育社会学,一是具有激进的批判色彩的源于英国的“新教育社会学”,从80年代后期开始,“新教育社会学”的势力逐渐衰退,分化并形成了一个流派:“教育的社会学分析”。

3. 日本的教育社会学

关于日本的教育社会学,除于仁兰等翻译的《日本教育社会学》还有:

刘星:《教育社会学在日本》,《各国教育研究》1983年第1期;吴康宁:《日本教育社会学的历史与现状》,《教育研究》1984年第11期;[日]江马成也,梁忠义、陈英招译:《社会结构的变动与教育——关于日本的“教育社会学”》,《外国教育研究》1988年第1期;厉以贤:《注重学生个性的班级社会学——介绍[日]片冈德雄教授〈班级社会学〉一书观点》,《教育研究》1993年第4期。

日本教育社会学的启蒙可以上推到本世纪初,而它的真正形成时期却是战后的1945—1954年,1949年大学开始开设教育社会学课程,1950年成立全国教育社会学学会,到80年代后期就有会员近1000名,1951年出版全国性的专业杂志《教育社会学研究》。日本教育社会学的引进和建立是按照美国占领军的指示进行的,美国当时正处于“教育的社会学”时期,这与日本战后处于“混乱时期”对社会实际问题的解决的需求吻合。1955—1975年日本经济从自立发展到高速增长,这也是日本教育社会学的发展

开时期,教育社会学具有了研究和专论的性质。从1976年开始进入了深入研究阶段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从总体来看,日本教育社会学起步较晚,但却跟上世界教育社会学的潮流。日本的经验是值得借鉴的。

4. 英国的教育社会学

很多著作和文章都从不同角度介绍过英国的教育社会学,而这方面的专论文章主要有:

环惜吾:《英国教育社会学的发展和近况简介》,《外国教育动态》1981年第1期;[英]班克斯,王佩雄译:《英国教育社会学30年》,《国外社会科学》1984年10月;吴纲:《英国教育社会学研究主题之演变》,《比较教育研究》1992年第2期。

人们一般把20世纪初到1944年教育法案这段时期的教育社会学称为传统的或旧的教育社会学,其主题是运用社会调查方法揭露教育机会的不平等以促进教育制度的改革。教育机会均等、教育与经济的关系和教育的社会功能是新兴教育社会学主线,而在不同时期则有较为具体的主题,50—60年代为“途径与机会”,60年代后期为“课程和内容”,70年代以来则是“社会和文化再生产”,到70年代形成了以伯恩斯坦(B. Bernstein, 1924—)和杨(M. F. D. Young, 1915—)为领袖的“新教育社会学”流派,它对世界教育社会学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它从80年代后期开始衰落,对于这个学派的反思和新走向,目前我国国内还没有介绍。

5. 法国的教育社会学

有关法国教育社会学的情况,人们了解更多的是孔德和迪尔凯姆的思想,孔德创立了社会学,迪尔凯姆建立了教育社会学,但二战使教育社会学研究中断,二战后又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二战后至50年代中期是法国社会学的恢复阶段,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是社会学开始分支化和专门化时期,教育社会学的学科地位得到确立,60年代后

期是“激烈论争”时期,70年代以来呈多样化发展趋势,而其中又数布迪厄(P. Bourdieu, 1930—)和帕塞隆(J. C. Passeron, 1930—)的“文化资本论”最富盛名。

有关法国现代教育社会学的情况,可以参见:

[法]J. C. 帕塞隆,胡伟译:《法国的教育社会学》,《国外社会学》1986年第4期;F. 埃朗,江小平编译:《教育社会学与调查研究的社会学:对普遍主义模式的思考》,《国外社会科学快报》1992年第4期;杨昌勇:《法国教育社会学概述》,《国外社会科学》1993年第2期;刘欣,王小华:《迪尔凯姆教育社会学思想述评》,《高等教育研究》1993年第4期。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对法国现代社会学和教育社会学的介绍,胡伟同志是有突出贡献的。1986年他邀请了十几位一直活跃在社会学各个领域的权威人士和著名专家为中国读者撰写专论介绍文章,并承担了全部翻译工作,《国外社会学》1986年第4期专辑刊登,后来又出了单行本;胡伟、H. 孟德拉斯、M. 威莱特主编,胡伟译:《当代法国社会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6月版。

6. 波兰的教育社会学

很少有人介绍波兰的教育社会学,有一两篇也是一语带过,而比较系统的要算唐宗清(发排为唐宗倩)翻译的波兰教育社会学家帕日泽克劳斯基的:《波兰的教育社会学》,《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87年第4期。波兰的教育社会学较注重实际问题的解决。

7.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教育社会学

这方面的情况可参阅:[澳]鲁珀特·古德曼,唐宗清译:《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教育社会学》,《国外社会学》1988年第2期。

从上文可以看出,我们对国外教育社会学研究相对发达的各国都有专门的介绍,而

对世界教育社会学有突出贡献的德国只有零星的介绍,没有专门的介绍研究,这可能与我国研究教育社会学的学者懂德文的人较少或与缺乏德文原版文献有关。有关意大利的也只是一篇,李克兴:《意大利师范学院教育系的课程设置和教育社会学的教研情况》,《外国教育》1981年第3期。另外,加拿大的教育社会学也没有专门的介绍。

三、国外教育社会学流派

对于教育社会学流派的划分,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都没有统一的意见,而对具体的学者的学派归属更存分歧,甚至有的教育社会学家本人也不承认别的学者对他们的学派划分。对国外教育社会学流派的介绍研究,要首推厉以贤等的《教育社会学引论》和英国学者布莱克莱吉等的《现代教育社会学流派》,而有的学者对国外教育学流派的综合介绍也是很有价值,如吴康宁:《当今欧美教育社会学三大学派》,《教育研究》1986年第9期;黄育馥:《当代西方教育社会学理论概貌》,《国外社会科学》1987年第7期和唐宗清:《当代西方教育社会学五大流派》,《上海教育学院学报》1991年第3期。而有的学者则对某个学派进行了专门的介绍。

1. 功能主义教育社会学

单篇介绍功能主义教育社会学的有:

王箭:《教育社会学中功能主义学说的理论走向及其启示》,《外国教育动态》1991年第6期;王郁川:《国外教育社会学“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述评》,《教育评论》1990年第1期。

功能主义在40—60年代占有统治地位,自70年代以来它处于低潮,人们批评最多的是它的意识形态倾向性和保守性,现在有一批学者致力于功能主义的复兴。对于这一情况我们还鲜有介绍。

2. 冲突论教育社会学

在西方,一般把马克思和韦伯看作是冲

突理论的奠基人。韦伯思想的现代发展构成“新韦伯主义”,与之相对的则是“新马克思主义”或“新教育社会学”。我们认为,应把“新教育社会学”作为一个单独的流派进行研究,因为它们基于“冲突”的研究所反映的意识形态倾向性与“新韦伯主义”是截然不同的。自80年代以来有些学者力图用韦伯的观点来取代各派教育社会学理论。以建立一门综合性教育社会学。

有冲突论教育社会学的情况除了综合的介绍外,单篇的还有:

[美]范伯格等,范国睿、王佩雄译:《马克思主义与教育上的冲突理论》,《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89年第3期;马和鸣:《西方“新韦伯主义”教育观概述》,《国外社会科学》1988年第3期。

3. 新教育社会学

新教育社会学是一个庞大的、松散学派,它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研究主题,伯恩斯坦·杨是教育知识社会学的代表,布迪厄是文化资本再生产理论的代表,鲍尔斯(S. Bowles)和金蒂斯(H. Gintis)是经济再生产理论的代表,阿普尔(M. W. Apple)等人是强制国家再生产理论的代表。这个学派在80年代后期开始衰退和分化。但近期的演变与发展情况我们还没有人作介绍。

有关新教育社会学的情况可见:

D. 斯沃茨,夏孝川译,《皮埃尔·布迪厄:社会不平等的文化传授》,《外国教育资料》1979年第3期;王川:《教育社会学的“再生产”理论》,《教育理论与实践》1988年第1期;王佩雄:《考察现代西方教育性质与职能的新视角——当代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教育观点述略》,夏正农:《西方学术思潮论丛》,学林出版社1989年11月版;赵希锵译:《教育管理:关于批判性的实践》,见胡森主编《国际教育百科全书(1)》,贵州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邹进:《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再生产理论》,见毕淑芝、王义高主编:《当

代外国教育思想研究》,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11月版;唐宗清:《伯恩斯坦教育社会学理论探析》,《上海教育学院学报》1988年第3期;杨昌勇:《新教育社会学产生的归因分析》,《国外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杨昌勇、孙传宏:《新教育社会学衰退的归因分析》,《国外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美]范伯格等,范国睿、王佩雄译:《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与教育》,《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89年第3期;[美]S. 鲍尔斯、H. 金蒂斯,王佩雄等译:《美国:经济生活与教育改革》,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年12月版;M·W·阿普尔,马和鸣译:《国家权力和法定知识的政治学》,《华东师大学报》(教科版)1992年第2期;萧俊明:《布尔迪厄的实践理论与文化再生理论》,《国外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P. 布尔迪厄的,肃草译:《理论性批判导论》,《国外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另外还可见王川:《教育社会学的“批判”理论述评》,《学术界动态》1988年第3期。

4. 解释主义教育社会学

解释主义教育社会学代表人物主要有美国的米德(G. H. Mead)和西科雷尔(A. V. Cicourel)等人。有关解释主义教育社会学还可以参阅:

[美]马奇班克斯、唐宗清译:《解释主义的教育社会学》,《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89年第3期;董昭江:《教育社会学中的解释学派述评》,《外国教育研究》1992年第2期。

四、几点思考

十余年来,我们的教育社会学经历了恢复与重建,现在已进入了初步繁荣阶段,无论是独自的研究还是国外教育社会学理论的介绍研究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是与世界教育社会学研究相比存在着相当的差

距,为了避免我们的“初步繁荣”期出现漫长的“高原期”而早日纳入世界教育社会学研究的潮流、取得应有的学术地位,下面仅就今后国外教育社会学介绍研究提出几点看法,以期引起大家的思考。

1. 要加强国外教育社会学理论的介绍研究。高质量的学术成果、思想理论总是在借鉴的基础上进行了新的概括或创新,那种拍拍脑袋想当然的精辟胡说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我国现在的教育社会学研究还相对落后,“借鉴”和“创新”不可偏废,今后更需要高水平的介绍研究。

2. 介绍要保持“原味”。综述与翻译各有自己的长处。综述往往具有系统性和概括性,但它已经过作者自己的理解和取舍,如有失误别人在转引或转述时就会造成以讹传讹的情况,因此综述者除了尽量避免解读失误之外,还应注明文献源,首次出现的关键词和人名要附上原文。翻译当然更容易保持原作者的本意,可是,无论是传统教育社会学的经典著作还是新兴教育社会学的名家名作,我们只有少得可怜的几个译本,文章的单篇翻译也不多,好在有张人杰、厉以贤的两个“文选”本。如能出版一套《国外教育社会学理论译丛》,想必我们今后的研究会上一个新台阶。

3. 介绍研究要有“点评”。高质量的翻译是高质量研究的基础。文章的单篇翻译也是必要的,但孤立的片断性的翻译又容易造成理解的片面性。因此要从“纯”介绍上升到研究性介绍,而综述不应满足于系统性和概括性,它还应该有自己的分析和评论,起到引导作用,要考虑外国理论的本土化问题,为我们自己的教育社会学建设服务。

4. 对于国外教育社会学的介绍研究,我们的两个全国性教育社会学团体应该起到分工协调和培养专家及提高研究水平的作用。